

钱选人物画局部



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衣若芬女士著文称“东坡笠屐故事”是虚构的,她认为东坡在海南并没有戴着斗笠、穿着木屐的故事。东坡谪琼居儋期间到底有没有在生活中戴过斗笠,穿过木屐?海南东坡文化研究学者本期讲谭为您一解究竟。

《东坡笠屐图》考

文 / 本刊特约撰稿 林冠群

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衣若芬女士著文《东坡海南笠屐故事的形成、传播与影响》认为“东坡笠屐故事”是虚构的,“东坡在海南到底有没有戴着斗笠、穿着木屐的故事”,她认为是没有的。

东坡谪琼居儋期间到底有没有在生活中戴过斗笠,穿过木屐?近千年后的我们要想切实地了解这个问题,唯有三种可能:一是东坡本人自己的说法;二是当时与东坡生活在一起的人们的说法;三是据传闻而记录、流传下来的说法。看来她的论文对这三个问题的是与非都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,所以网友“野老放歌”以一篇《一个没有证据的结论》(简称《结论》)对她的观点进行了反驳。

我同意《结论》“东坡笠屐图”不是虚构的观点。因为从现存的史料分析,根据传闻而记录、流传下来的说法可以证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。

然而,《结论》所给出的几个论点和论据,仔细推敲起来仍嫌根据不足且有错误,故特再加考证如下。

东坡与李伯时关系辨

《结论》说:“东坡笠屐故事有文字记载的,最早见于北宋周紫芝的《太仓稊米集》。”又说“南宋费衮的《梁溪漫志》和张端义的《贵耳集》与周紫芝的记述基本相同。”

其实两者之间有很大差别。周紫芝说的是东坡独自出游,往北方向,“偶得箬笠戴归”,没有提到着屐;而张端义与费衮说的是东坡到黎子云家,往东方向,遇雨,借笠屐而归。相同的只是:妇女儿童相争笑,群犬争吠。然而,就这一点差别同异恰好说明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,即这个传闻不仅止得于一家,而是群众口口相传,因而得以保存了故事的基本内容。近千年来,从没有人对此表示过异议。

《结论》说:“如果说周紫芝在《太仓稊米集》的记述是东坡笠屐故事传播最早的文字,那么李伯时的《东坡笠屐图》就是传播最早的图像。”

这个说法却有疑问,似乎没有深入了解东坡与李伯时之间的关系。李伯时名公麟,字伯时。北宋著名画家。《宋史》卷444与《东都事略》卷116都有传,李公麟有个弟弟叫李公寅,字亮工。王明清《挥麈三录》卷二载:“元祐中,舒州有李亮工者,以文鸣缙绅间,与苏、黄游。两集中有与其唱和。而李伯时以善丹青,妙绝冠世,且好古博雅,多收三代以来鼎彝之类,为《考古图》。”又有李元中,字画之工,追踪钟、王。时号“龙眠三李”。同年登进士第,出处相若。约以先贵毋相忘。其后仕俱不显。”所谓“仕俱不显”,指这三个人中进士后,仕途并不得意,当不上大官。李伯时后来得到陆游的祖父陆佃的荐举,当了个“御史检法”。李伯时因为善画得名,与东坡等交往甚密,但

此人气节操守甚差。邵博《闻见后录》卷27载:“晁以道言,当东坡盛时,李伯时至为画家庙像。后东坡南迁,公麟在京师,遇苏氏两院子弟于途,以扇障面,不为一揖。其薄如此,故以道鄙之,尽弃平日所有公麟之画于人。”

这就是说,当东坡仕途得意,受到皇室重用,地位显赫时,李公麟特别殷勤,连苏家祖宗的肖像他也代为绘制,但东坡得罪被贬之后,他便避之惟恐不及,连在京城碰到东坡兄弟两家的子弟他都不敢打招呼,以扇遮面远远躲开!实是个趋炎附势之人。不但如此,他还攀附权贵,尽力讨好奸臣蔡京。元祐八年,有咸阳百姓段义向朝廷进献玉玺,蔡京为愚弄昏庸的宋哲宗,诬说这玉玺是秦始皇的宝物,当朝臣们就此争论不休时,李伯时附会蔡京,硬说是秦朝的国宝,李斯题的字。这种欺人的把戏,瞒不了世人。王文浩在《苏诗总案》卷42中指出:“时惇、卞为宰执,京为两制首,乃主议者。京意欲希合其主,麟又欲希合京以通惇、卞,故云‘玺’也。徽宗立,复有‘夏禹元圭’之事,皆欲以此欺中外,而饰成功。”李伯时是想通过讨好蔡京,以进一步巴结上宰相章惇与蔡卞。但他所鉴定为“李斯题字”的传国玉玺,至北宋灭亡时,入侵的金人对此“宝贝”不屑一顾,连敌人也欺骗不了。

李伯时既是这种势利之人,他肯为落难天涯、死生未卜的东坡画这笠屐图吗?而且,更为现实的是,自东坡被贬岭南及海南之后,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,极少有人得知他的消息。就连与他最要好的黄庭坚、秦少游、张耒、晁无咎等辈“苏门四学士”也都断绝了音问,而东坡怕连累亲友,也特别注意掩盖自己的行踪,即使偶有人来信探问,他也隐忍不发,不予回答。如遇赦北归途中,他曾经的幕僚、好友李之仪来信问安,他回信说:“某启。辱书多矣,无不达者。然终不一答,非独衰病简懒之过,实以罪垢深重,不忍更以无益寒温之问玷累知交……”多次来信都收到,就怕以这些无关紧要的问候之词连累到好朋友。这就是东坡为人处世的胸怀气度。而对于那些势利的人来说,那就更希望离得越远越好,不相闻问了。所以伴随他远走天涯的小儿子苏过也曾经慨叹:“先君之迁于南也,平昔亲旧不敢问安否者七年。”这七年时间正是东坡谪惠贬儋期间。在此情况下,不要说像李伯时这样的名利客,就是至亲好友也难以知道东坡在海外的生存状况。

然而,《结论》说:“东坡北归时,曾写下《次韵韶州李通直二首》(李通直,即李伯时)《李伯时画其弟亮工(旧隐宅图)》。二诗皆作于元符三年十二月,距离东坡辞世不到一年。东坡的诗给我们提供一个重要的信息:一是东坡北归时,他们还是密切来往,可以肯定李伯时当时也很了解东坡居儋的情况……”

其实,东坡这两首诗,前一首不是写给李伯时的,“李通直”不是李伯时,而是他的弟弟李亮工。为什么称李亮工为“李通直”?“通直”是李亮工的官

阶“通直郎”(宋代正八品散官)的简称。当时李亮工任韶州知州的辅佐官员(即韶倅)。所以这两首诗(实为三首)都是写给李亮工的,与李伯时全无关系,且当时李伯时已经因病退养在家(《宋史》说他“元符三年,病瘵,遂致仕。”)瘵,即手脚麻木,举动艰难的症状。种种情况表明,在这个时候他不可能与东坡“密切来往”,更不可能“很了解东坡居儋的情况”。

费衮《梁溪漫志》卷四称:“建中靖国元年,东坡自儋北归,卜居阳羨。阳羨士大夫犹畏而不敢与之游。”这是东坡在舒州会见李亮工后,次年到了阳羨的情形。此时朝廷又传来不利于“元祐党人”的消息,所以世风忽变,像李伯时这样的人怎么会“密切”与东坡的关系?何况他已经病废,难有作为。孔凡礼先生在《苏轼年谱》卷38中称:“入儋后,李公麟(伯时)为苏轼画像。”但他所引证的材料表明画的不是《东坡笠屐图》而是一幅《东坡水城小像》与一幅《东坡乘棹图》。然而,就这两幅图而言,究竟是否作于东坡入儋后,孔先生也没有绝对的把握,只能以“当为苏轼入儋初作”、“画当亦作于入儋后”的语气表示待考而已。他在引用黄庭坚《东坡先生真赞三首》之二时,仅凭一句:“投之于鯨鲸之波”,便断言画“作于苏轼谪儋时”,但接着又加一句:“或为题李公麟此画像而作。”说明他没有亲眼见过李公麟的那幅画,所以不能说是定论。根据以上分析来看,李伯时在东坡南迁之后,不可能为东坡画像,更无机会画《东坡笠屐图》。

其实从李伯时已经病废不起的情况看,《结论》引用周紫芝的诗:“凭谁唤起王摩诘,画作东坡笠屐图”,已经道出言外之意,说明想请李伯时为东坡画笠屐图仅能是一种愿望而已,不可能实现了。王摩诘即王维,唐代著名画家、诗人。东坡曾在诗里用以指代李伯时。如《李伯时画其弟亮工(旧隐宅图)》诗云:“乐天早退今安有,摩诘长闲古亦无。”这里的“摩诘”即指病废不起的李伯时。《梁溪漫志》在引用周紫芝的诗之后又加了一句:“今时亦有画此者,然多俗笔也。”这就是说,到了南宋以后,虽然没有李伯时的画作,社会上也有人画过《东坡笠屐图》,不过大多是一般的画家,没有李伯时那样的高手罢了。

铁证待判: 东坡书院《东坡笠屐图》谁人作品?

但《结论》提供了一个似乎很“铁”的证据,说:“广东省博物馆赠送两张《东坡笠屐图》照片,托我转交东坡书院。这张《东坡笠屐图》(见附图)为朱兰岫临摹。画幅多处有清代书法家、金石家翁方纲的题词。翁方纲的题词鲜为人知,现摘录如下:季枢藏松雪画像皆与宋真本相合。盖疏眉凤眼,秀摄江山,两颊清峙,而须不甚多。右颊近上处黑子数点,是为宋李伯时之真本。赵松雪、朱兰岫所临皆是证也。”

(下转 B12)



朱兰岫临摹的《东坡笠屐图》